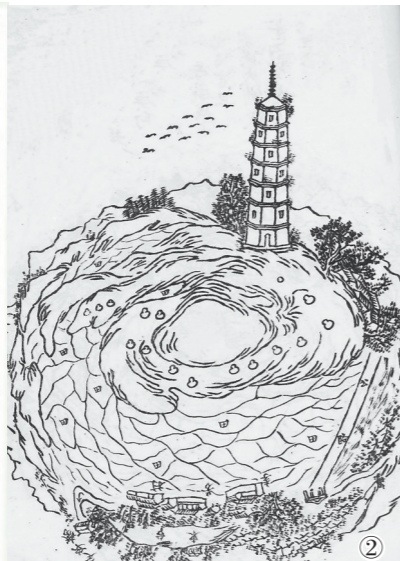


乡土史记

# 连城文塔 汀南巨观

□李元杰 文/图



①解放前拍摄的连城文塔  
②连城文塔图(1947年《连城文刊李氏七修族谱》所绘)  
③现存的连城文塔砖窑遗址(池塘处)

文塔,也叫文峰塔、文笔塔、文昌塔、巽峰塔,是中国古代塔式建筑中的一种。古时候连城百姓非常重视文运昌盛,认为文塔可以旺文风、启人智、利学业、成功名,所以在县邑的巽位(东南方)修建文塔,希望当地可以多出文人才子。

## 连城文塔的建造

根据清康熙版《连城县志》记载,连城文塔建成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距今近430年,由连城知县、广东琼山(今海南省琼山市)人牛大纬所建。后吏部尚书、清流人裴应章游连城,写下了《文峰塔记》。

《文峰塔记》先是记载了牛大纬的前任,明万历年间汀州府同知署连城知县的广西马平人陈善行(连城百姓敬称其为阳春陈公)甫一到任,连城学子进言道:城南一里许有李坊庵,为县邑之巽方,有塔之故址但未建塔,建议在现成的塔址上建塔。陈善行“唯唯首肯,顾独吝藏拙,事遂寝”。因县衙财政困乏,陈善行不愿意加重连城百姓负担,修塔大事只能停止。

连城文塔故塔基建于何时,查无文献的记载。如果塔基建于宋、元或明初期,时间久远,风吹雨淋,塔基必毁。因此,可以推测连城文塔旧基最有可能建于明中后期,属建造文塔的时间并不远。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牛大纬任连城县令,连城诸学子复进言在李

坊庵前现有塔址上修建文塔。牛大纬跃然曰:“人事气运常相关,安有地灵而人不杰者?……矧有故址可循,天实启之,奈何逡巡。”于是择吉日动工。牛大纬捐出薪俸,由连城好义者捐款,县衙派出5个男丁的劳役,其他则由连城百姓出工出力。建塔所用的木材、石料、砖块由附近采办或烧制,会雕刻的石匠则在浙江西部聘请。

连城文塔的具体建设由典史章汝种“董领其事”,建塔始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冬,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秋落成,历时两年。裴应章《文峰塔记》记载连城文塔建成后的恢宏气势:“翼然、屹然、岫嶙然,煌煌伟观,如笋如笔,摩碧汉而插青霄,真汀南之巨观,文献之休祥也。”

清康熙版《连城县志》还记载了带头倡议并捐款修建文塔的善义者有13人,青史留名者为李周臣、谢必恭、钱文林、李榆、吴宪、董松、赖琼、谢佐等8人。

## 连城文塔的大小

根据裴应章《文峰塔记》记载,连城文塔“基广一百尺,高一百三十尺,费金二千有奇。塔下建文昌祠,后立祠,世世俎豆大夫,以志不忘”,以及清康熙版《连城县志》“文塔,南关外李坊庵……前有文昌祠及书舍数十间”“牛公祠,一学后,一文塔前,祀令牛大纬文野公,绿首李周臣、吴宪等”的相关记载,经过换算,我们可以知

道,连城文塔塔基为边长32.7米的正方形,塔高42.51米。

塔下面对县城位置半山峦处建有文昌祠及书舍数十间,文昌祠用于祭祀文昌帝君,祈求连城文风鼎盛,而书舍则是学生读书的教室,可见这里还是当时的官办学校。而文塔之后,今天规划的9号路之前,则建有牛公祠。

根据湖广布政司左参政、永定人沈孟化所撰《牛公崇德碑记》,牛大纬除了修建连城文塔外,还当道拦截明廷高官申诉朝廷对连城不合理的税赋,为连城百姓免除了一半的田赋;其刚到任,连城连年灾荒,他平价售卖官仓,救活大量百姓;牛大纬推行乡下普遍设义仓私塾,大力修城修桥铺路,打击匪盗,纠正奸邪,连城士大夫赞其为“循吏”,为他在儒学后和文塔后修建生祠,用田租五百余石(古时15斤为一秤,明代1斤为今天的596.8克,500秤折合今天4500公斤),作为每年祭祀牛大纬的费用。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今天实地考察,文塔、文昌祠、牛公祠和学舍总占地面积约40亩。

## 连城文塔的花费

根据裴应章《文峰塔记》记载,连城文塔“费金二千有奇”,指的是花费白银2000多两,明万历年间一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950元,则花费相当于今天的190万元。但是,连城老百姓大量的义务工和善义者的义务出工,并未统计在

内。塔址为旧有,又节省了一笔大的开支。其实花费远不止2000多两。

义务工中有的要去采购木材、运输木材,还需要木匠精雕细刻。此外,还有采石工、运石工、挖泥工、烧炭工、烧砖瓦工、运砖瓦工、挑土工,还有督工、记账等人力物力。如果我们按每天有100人参与建塔计算,费时21个月,每工每月需1.5两银子(按明万历年间耕农的平均收入计算),则工钱折合银子3150两。

旧的塔基折合塔身的四分之一计算,为500两。

这样估算,整个塔建造的完整花费不少于5650两,折合今天的人民币相当于536万元。

## 连城文塔的遗迹

连城文塔建在今天莲峰镇李坊村罗家营之最高处,李坊庵旧址前,1958年连城修建机场后拆除。

据老人家回忆,塔基四周有排水沟,沟内水流清澈见底,各种鱼儿欢快畅游,当地许多人小时候在文塔沟里抓过鱼。塔为七层,一层有门四个,登塔的第一层有五级台阶。塔四周建有木质楼梯,老百姓可以沿着木楼梯逐层而上,直到顶层。

1933年3月上旬,国民党十九路军到连城“围剿”红军时,1万余士兵曾进驻过连城。由于国民党士兵晚上睡觉没有床板,他们便将连城文塔的木楼梯面板全部拆下作为床铺。十九路军

后被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东方军打败溃逃,但此后连城文塔的木楼梯面板也没有被装回。

塔每层都有窗户,塔内密集生活着许多鸟。有不少李坊村村民回忆,他们的祖辈、父辈小时候还上过塔的上部掏鸟。文塔塔顶被雷击损坏,长了一棵青翠的胡椒树。当地老百姓回忆,为修建连城文塔,当时在文塔附近挖泥烧砖,留下3口池塘,今天能看到的还有一口。

而《连城县志》所记载的李坊庵,其名实为白衣庵,位于董屋山庄西向的田野中间,为奉祀白衣大士的一个古老的尼姑庵,今天的白衣庵遗址已然无存,但庵前的地名叫做“庵前盘”,则一直流传至今。笔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文塔遗址附近还有一块珍贵的文塔塔砖,长、宽、厚分别是35、17、13厘米,重达16.2公斤,十分坚实和厚重。

明崇祯八年(1635年)任连城主簿的南陵人刘芳称登临文塔后,写下一篇《登文峰塔》七言律诗:七层突兀耸东城,览胜春游淑气迎。铃阁风高声促急,檀窗日丽景幽清。荒郊草木涵朝露,幽壑禽鱼悦晚晴。此日趋陪怀仰止,高明词赋重西京。

刘芳称的文塔诗赞美了文塔如同旗帜般高耸、塔铃声促,虽处于荒郊野外,但她“涵朝露”“悦禽鱼”,令人不禁思绪万千、回味无穷。

(作者单位:中共连城县委党史和方志研究室)

闽台史话

# 东山、台湾关帝庙的历史渊源

□杨文军 文/图

东山关帝庙位于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嵵山麓凤动石风景区内,始建于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亦被称为“铜山关帝庙”。关于东山的关帝信仰之始,《东山关帝庙志》有所记载:“唐垂拱二年(686年),大唐将领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领六十四姓将士开拓闽南,建置漳州,驻军东山岛。为安抚将士,从家乡引来关公香火,为开疆守土将士心灵所依。”

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鼎建铜城关王庙记》载:“铜城东,天尊堂之右,有祠一所,汉关羽云长之宫也。……国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城铜山以防倭寇,刻像祀之,以护官兵,官兵赖之。后官使往来之络绎,与夫析者、赛者、同吉凶者,须臾聚可数十人,而不能以容,人咸病其隘。亦有喜施者欲辟之,又以工程浩大,艰于济。正德戊辰(1508年)岁正月,云霄吴公子约避寇于铜,同铜善士黄公宗继等九人,募众资财崇建之。”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漳州府志》卷二十八“古迹”记载:“关帝庙,郡城者,在开元寺右,明万历年年(1573年)建,东隅射圃一再北门外里



2023年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

许。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知县汪绅文重修,镇海、陆鳌、铜山各有庙。”上述说明当时漳州的三个卫所均有关帝庙,彰显出军事与关帝信仰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值得注意的是,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铜山志》卷五“祠祀志”明确记载了铜山关帝庙的地理位置与香火旺盛的景象,即“铜山关帝庙,在城东阳左于宝智寺邻,明正德、隆庆年间助兵败贼,众皆神之。至今声灵赫濯,四海钦仰,其长泰寇窟与云霄山下港,则皆自铜请去香火”。

可见东山关帝庙建立的历史背景与日常功能,即集军事防御与民间信仰于一体。东山关帝庙的修建起初是为驻守在岛内的将士心灵得到慰藉,后随着岛内人口的增多,来往于该庙的进香百姓络绎不绝,香火旺盛,兼具抽签问吉凶、祈禱疾病康复等功能,逐渐成为岛内百姓信仰重要场所,深刻地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与民间习俗的变迁。

闽台关帝信仰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明朝末年。明郑时期,厦门、漳州、泉州等地百姓随郑氏集团渡台,渡台后在岛内开垦、建立政权,同时将家乡关帝庙的香火带到台湾,兴建关帝庙奉祀,并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据史料记载,台湾关帝庙的神缘主要来自漳州铜陵(东山)关帝庙和泉州通淮关帝庙。

以东山关帝庙为例,《台湾通史》卷二记载了南明永历十八年(1662年)

许。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知县汪绅文重修,镇海、陆鳌、铜山各有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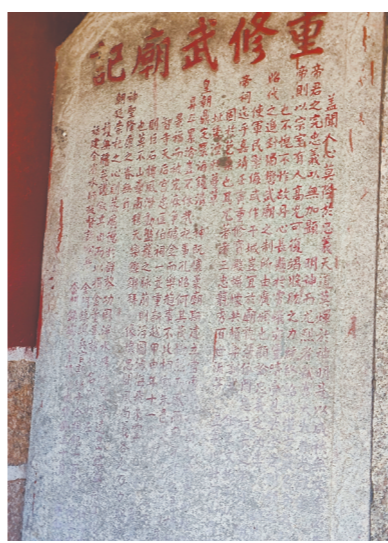
上述说明当时漳州的三个卫所均有关帝庙,彰显出军事与关帝信仰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值得注意的是,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铜山志》卷五“祠祀志”明确记载了铜山关帝庙的地理位置与香火旺盛的景象,即“铜山关帝庙,在城东阳左于宝智寺邻,明正德、隆庆年间助兵败贼,众皆神之。至今声灵赫濯,四海钦仰,其长泰寇窟与云霄山下港,则皆自铜请去香火”。

可见东山关帝庙建立的历史背景与日常功能,即集军事防御与民间信仰于一体。东山关帝庙的修建起初是为驻守在岛内的将士心灵得到慰藉,后随着岛内人口的增多,来往于该庙的进香百姓络绎不绝,香火旺盛,兼具抽签问吉凶、祈禱疾病康复等功能,逐渐成为岛内百姓信仰重要场所,深刻地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与民间习俗的变迁。

闽台关帝信仰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明朝末年。明郑时期,厦门、漳州、泉州等地百姓随郑氏集团渡台,渡台后在岛内开垦、建立政权,同时将家乡关帝庙的香火带到台湾,兴建关帝庙奉祀,并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据史料记载,台湾关帝庙的神缘主要来自漳州铜陵(东山)关帝庙和泉州通淮关帝庙。

以东山关帝庙为例,《台湾通史》卷二记载了南明永历十八年(1662年)

较而言,《东山关帝庙志》对东山、台湾关帝庙的历史渊源记录比较翔实,即“明嘉靖年间,铜山水寨扩建



东山关帝庙《重修庙记》

郑经听从洪旭言撤离铜山(今东山)的建议,携“宗室宁靖王、泸溪王、巴东王、鲁王世子”、“乡绅王忠孝、辜朝荐、卢若腾、沈休期、郭贞一、李茂春悉扁舟从”。而后,明室宁靖王朱木桂在台南王府内建造关帝庙,庙宇形式仿效铜山关帝庙。亦有《台湾通史》卷十“典礼志”中的“武庙:在府治镇北坊……郑氏建,祀汉忠义侯关羽。中有一宁靖王手书之额,题曰‘亘古一人’可以佐证。

相较而言,《东山关帝庙志》对东山、台湾关帝庙的历史渊源记录比较翔实,即“明嘉靖年间,铜山水寨扩建

游兵营,辖台湾的淡水、澎湖、凤山。当时,参加水操的兵丁,胸前都挂着‘东山关圣君’的香火,祈求平安。退伍后,有部分留在台湾、澎湖……这些人就把关帝香火奉祀居留地,作为保护神,日夜奉拜”。

从分灵关系来看,明代台湾兴建的澎湖铜山馆武神殿、台南祀典武庙、台南山西宫、高雄关帝庙,清代兴建的澎湖红毛城关帝庙、台中圣寿宫、高雄文衡殿、嘉义关帝庙、宜兰礁溪协天庙等关帝庙尊奉源于东山关帝庙。目前与东山关帝庙保持特殊关系的台湾关帝庙多达900多家,足以说明东山关帝庙对台湾关帝庙产生较大的影响。

1996年11月20日,东山关帝庙被国务院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建筑角度而言,东山关帝庙整体上蔚为大观,庙的木结构部分为明代、部分为清代和近代建筑。悬山顶,绿瓦。多是石棱柱,柱础鼓状。太子亭为木斗拱建筑,历经百年依然屹立。彩瓷剪贴雕广泛应用于该庙建筑,成为一大特色,石雕、金木雕、漆金画更是美轮美奂,为该庙增添了耀眼的光彩。

东山关帝庙有众多文物古迹,具有重要历史和科研价值。如清代祭祀器皿铜钟、进香火的香炉;明代黄道顶题刻的楹联和清代监生陈联福、陈联春题联;明正德年间的《鼎建铜城关王庙记》、清康熙时期的《公立关永茂碑记》、光绪年间的《重修武庙碑记》等;明朝的“武圣殿”匾额、文三俊赞文匾、清代的“山西神主”匾等。

说史谈闻

## 闽南方言的流播

□范莹 林天送

闽方言是由多来源的移民和多次的语言间的相互影响而形成和演变的,这是学界的共识。作为闽方言中重要的一种,闽南话同其他闽方言一样,因保存了上古音和上古词,而具有保守、存古的一面,也因此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各种语言、文化的影响而体现出发展、包容的一面。

清政府于1684年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布政使司,自此漳州府和泉州府输出大批移民迁入台湾。大量的漳泉移民势必伴随着语言的融合,17、18世纪的台湾由此形成了“漳泉滥”。自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厦门被迫成为通商口岸,此时周围漳泉人口涌入,漳泉腔发生混合,结果产生了厦门话。从混合语的来源来看,二者均来源于漳州腔和泉州腔的混合,即“漳泉滥”。这就解释了人们一般的语感,即厦门闽南话和台湾闽南话沟通起来差异最小。

除了跨过台湾海峡以外,闽南人也带着方言和文化向福建省外移民。明清之际,漳泉地区闽南人向北进入浙江温州一带,至今这些移民的后裔仍主要居住在浙南,浙南闽南话。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闽南话是由闽南移民从莆田开始向南传至粤东潮汕地区和雷琼地区的。这主要是因为现在的潮汕、海南地区的闽语和莆仙方言还共有一部分特征词,例如床、沸水、白肉和乌肉等。北宋前,莆田曾先后属福州和泉州管辖,北宋后从泉州府划分出来,因此宋元时期莆田话和泉州话并无明显差异。据史料记载,包括潮汕在内的潮雷琼地区人口在唐代时落后于漳泉人口的数量,然而到元明时期,前者已经远远超过了后者,可见南下的移民使得潮雷琼地区人口迅速增长。

明代由于禁海令的颁发,以海为生的闽南人为了维系生计便勇闯南洋谋生。顾炎武为《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曾云:“……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两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明代漳州人张燮的《东西洋考》在提到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政府自16世纪末期从广东、福建招募华工云:“华人多诣吕宋,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洞内生活,渐至数万。”

闽南话也伴随着下南洋的移民被带入了东南亚各国,包括现实的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并逐渐形成了海外的闽南话区。由于这些闽南移民的来源多样,海外闽南话区呈现了一定的区域性特征,其内部的闽南话差异较大,具有融合一致的特征,同时也受到了外族语言的一些影响。这一点可以从陈晓锦调查的马来西亚新山市的潮州话和周长祥、周清海描述的新加坡闽南话为证。

在南洋的闽南移民也并非仅说母语闽南话。在和本地原住民通商通婚等互动活动中,不少人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例如他加禄语、马来语和印尼语等。与双语或多语现象密切相关的是闽南话和当地语言出现了借词现象,主要体现在借词上。

根据李如龙的统计,闽南话就有100多条马来借词,例如实叻、巴刹、五股架、猪、朱律、加贝、加咧、阿铝板、十笔仔等。语言借贷并不一定是单向的,马来语也有200多条闽南话借词,例如他、汝、公、哥、叔、婶、侨胞、新客、唐山、豆腐、面粉、米线、杂菜、龟、螺等。在这些借词中,部分是常用的核心词甚至是基本词。这种程度的词汇借贷是南洋闽南话和马来语发生深度接触的显著证据,也是闽南话与本地语言平等地位的体现。

自宋元起,闽南方言与文化逐渐走向鼎盛。到大约100年前,闽南戏曲等民间艺术遍布各城镇、乡村以及海外。定居南洋的闽南人自称“唐人”,他们讲究祖先血缘,除养家外,还常常返回家乡,兴建宗祠、办学铺路、建设家乡的贡献不胜枚举,不认祖宗的被责为“番猪”。清代中叶之后闽南的侨批业密布,侨汇川流不息,这在其他地区是罕见的。

闽南人向海为生,他们敢于乘风破浪、勇闯天南海北的精神被称为“海洋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既顽强又包容,强烈体现在闽南人在他乡仍能保留自己的母语和故土的习惯,包容体现在异乡闽南人与当地人和平共处,对当地文化习俗的尊重。